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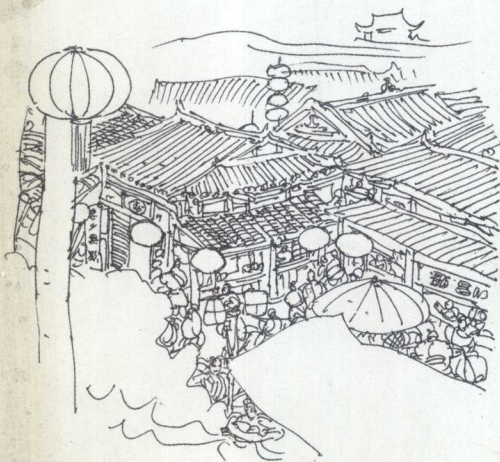
晋国 商业文化 猗顿化

晋国原本是一个偏僻闭塞、经济落后的偏侯小国，经过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才跨入经济兴盛、礼法文明的历史舞台。从而推动了晋国商业文化的成长以及像猗顿这样的大商人的出现。

王树山

崔浩然
南元礼 / 著

邱文选
范金红 /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 审:甘 弋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国商业文化/邱文选著. 晋国巨商猗顿/王树山等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88-3

I. ①晋…②晋… II. ①邱…②王… III. ①商业经济
文化—研究—晋国(前11世纪~前4世纪中)②猗顿—
生平事迹 IV. ①F729.②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5832号

晋国商业文化·晋国巨商猗顿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

邱文选等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02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ISBN 7-203-04188-3
K·204 定价:30.00元(套)

引 子

晋国是在 3000 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11 世纪初叶，西周王朝分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个姬姓侯国。最初叫唐国，开国君主叫唐叔虞（姬虞），唐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改唐为晋，从此称晋国。晋国立国时只是一个“百里偏侯”的诸侯小国，其疆域仅有现在山西南部从翼城、闻喜、曲沃、侯马、新绛、襄汾一带汾水下游与浹河交汇百里左右的范围，而且境内多山，交通闭塞，又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还受着周边齐、鲁、燕、卫等大国的制约和威胁。在这样内外不利的环境下，晋国的商业经济自然难以有兴旺、发达的机遇，商业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在开国君主唐叔虞和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下，终于逐步改变了晋国初期所面临的被动、不利境遇，将晋国从偏僻闭塞、经济滞后的偏侯小国，推上经济复苏、礼法文明的历史舞台。晋国的商业经济一步步发展起来，晋国商业文化也由早期的孕育而茁壮成长起来，进而一步步繁荣昌盛，绽放出鲜艳之花，结出累累之果。

一、早期孕育

作为晋国文化整体组成部分的晋国商业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时代，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进入到尧舜时期，生产的产品多了，剩余的产品也多了，于是出现了“服牛乘马，牛仓羊廩”，即有了驯服野牛狂马的圈厩，储藏牛羊肉皮的仓廩，人们还吃上粳（lǐ 粗米）、粢（zī 谷类）等谷食，嚐上牛羊等肉类，穿上麕裘做的衣服。互相交换也就成了不可少的事了。到了夏代，开始“设制度，立田里”，推行“五十而贡”的土地政策和定额贡纳税赋政策。就是每人分得五十亩田地，各人把田地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国王或贵族。这样，自己还常常能留用一部分供自己家庭享用或拿到集市去交换，集市贸易自然就兴旺起来。

到了西周时期，推行司市制度，产品交换和贸易越来越兴盛。那时已在人烟密集的地方设有集市，集市上有专管市场秩序的，有专管度量物价的，还有专管收取税赋的专业人员。上市的物货有黍、稷、牛、马、珠宝，还出现斧、布（一种铲型金属货币）、贝（蚌壳）等成为古代设施齐全、商品丰富的商业贸易市场。晋国是建立在古代夏墟唐尧后裔古唐国领域上的诸侯国家，开国君主唐叔虞还因地制宜推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政策。所以，从史前社会一直到夏代以后的一些重要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特别是西周初期的司市制度，很可能被晋国继承了下来，成

为晋国商业文化孕育、成长的肥沃土壤。

二、萌芽滋生

晋国商业文化脱胎于晋国的商业经济。就是说有了兴旺发达的商业经济，比如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必要的交通设施，市场上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设备，特别是鼓励商品畅通流行的交易环境和保护商品顺利有序运行的贸易政策等等，都要应有尽有，才会有繁荣昌盛的商业文化。

晋国的商业经济能在当初还很不利的外内条件下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因素是依靠晋国建立伊始推行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这个施政方针，为晋国工商业的崛起和兴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所谓“夏政”和“戎索”，可以说既是晋国要遵循的政治制度，也是要推行的经济政策。唐叔虞受封后，根据晋国地处夏人故墟和境内民族杂居、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并存的具体环境，实行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如适当保留夏代以来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依照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来分配、调整土地，以便利农牧业生产，而暂不实行西周王朝的井田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实行的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虽然带有一种“离经叛道”的色彩，但从晋国的角度说，这一举措既是遵照周朝的命令而行事，又完全符合晋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特区”。它

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的胸怀和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气度，从而为晋国商业经济的拓展铺平了道路。

叔虞实行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适应了国人与戎狄民族的心愿，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当时收到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据文献记载：在叔虞当政后的二三年内，就获得农业大丰收，还出现了不同耕地内同株异穗、一株多穗的“嘉禾”。当叔虞将一株“嘉禾”呈献周王朝后，曾一度引起轰动，周成王和摄政大臣周公旦互相赋诗咏赞，歌颂丰收盛世。这一方面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对他们决策胜利的喜悦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对叔虞政绩的赞许和肯定。

叔虞之后，到了第十位君主晋文侯时，晋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信息和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自唐叔虞推行“夏政”、“戎索”政策到晋文侯励精图治的 300 多年间，晋国的农耕业、畜牧业、手工业、纺织业等方面，尤其是冶炼、铸造以及手工制造工艺方面，都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这就为推动晋国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三、茁壮成长

当历史由西周进入春秋时代的半个多世纪里，晋国由于“曲沃代翼”的内部争战，严重破坏了国内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程序，导致“政教尤衰”，国势急剧衰败下来。直到公元前 679 年晋武公以新的宗主取代旧的宗主后，晋国才

得以踏上复兴的道路。公元前 676 年，晋武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后，一方面采纳士蒍的计谋，“尽杀群公子”，削平威胁公室的公族势力，加强了国君和公室的权力；同时重用荀息的谋略，远交近攻，先后吞灭了霍、虢、虞、冀、黎、郇、董、韩、魏、贾等 10 余小国，把国土扩展到黄河南岸、西岸即今河南北部、西北部，陕西省东部沿黄河一带。这些地方，都是出产粮、帛、丝、煤、铁、铜、铅等战略资源的要地；与此同时，晋国还获得解、芮的池盐，垂棘（今山西潞城县一带）产的玉璧，屈地（今山西吉县一带）产的乘马等特产。这样，既增加了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又获得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军事物资，从此走上“财用不匮”的富足道路。之后，晋惠公夷吾又于公元前 645 年“作爰田，作州兵”，即是用国家的公有领地，奖励作战有功的将士，以州为单位增加额外的兵赋或兵额。这个措施对增强晋国防卫力量起到重要作用。以上，从晋武公曲沃代翼，晋献公拓展国土到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晋国国势一步步从瘫痪走向复苏，晋国的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也一步步茁壮成长起来了。

公元前 636 年，晋文公（重耳）返国当政，开创了晋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位晋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英武国君，也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新家。他在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时，因受谗陷被逼逃亡国外 19 年，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返国后励精图治，革新内政，整顿军旅，为强兵富国创造了条件。他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革新举措：一、改革生产工具，奖励垦殖，节用财力，发展生产；二、放

弃国家债务，救济贫困生民，减轻国人负担，以缓和庶民与公室的矛盾和对抗；三、起用旧族，赏赐功臣，重用出身微贱而有才能的异姓人，实行新的用人政策。上述改革内容和举措，无疑是最有力的激励机制，为晋国的经济振兴和政治革新注入了活力，也为繁荣晋国商业经济奠定了基础。

为繁荣晋国的商业经济，晋文公制定了“工商食官”的制度，推行了有利于工商贸易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具体政策。所谓“工商食官”就是由官营工商部门即官府给予从事工商业生产劳动者一定的生活资料，作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庭生活或从事再生产的费用。简单地说，所谓“工商食官”制度就是工商业者“食”于官家的体制。这种由官府统一经营的官营工商业体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官办工商业，从而也产生了最早的“商官”或“官商”。其实，类似的“商官”或“官商”，在晋文公之前就已出现，文公之后更加普遍了。比如晋献公时参与铲除“桓庄之族”，后又主持扩建绛都，广扩旧宫的股肱重臣、时任大司徒与大司空要职的士蒍，他既经营规模巨大的“城绛”和“广宫”的建筑工程，就必然经营庞大的建筑器材、建筑物资的购销交易事宜，当然也就要兼“商官”的任务。之后，又如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派遣原从楚国投奔晋国并被晋景公器重封为邢公的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时，还曾传教吴人乘甲射御及战阵之法。当时晋国盛产木材、竹、谷、旄（mǎo，毛。即，四季生毛的旄牛之毛，一种贵重皮毛）、玉及铜、铅等产品，吴越多产鱼盐之属，且多有黄金，互

相都有所需用的物产。申公巫臣第一次使吴之后，出现了晋吴联盟数十年的睦邻关系。申公使吴，除睦邻誓盟外也必然负有像现在外交商务官员从事物资交易的使命。到晋悼公时，身为司马的魏绛，向悼公提出“戎狄荐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的建议，请悼公依据戎狄民族重视中国的货物而轻视土地的习惯，可以用货物来换取他们的土地。晋国与戎狄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用丝麻、陶器、食盐、粮黍以及日用工具换取牛、马、皮毛等畜产品。魏绛出使戎狄进行和戎活动，必然肩负互通信息、互通有无与物资交易的使命。此外，近年在侯马晋国新田遗址曾出土一柄吴国王室宝剑，这很可能就是晋吴联盟时吴王赠给晋国国君或卿大夫的礼物。而晋侯也必有礼品回赠。晋吴国君互赠礼品，就带有官办工商之间互相馈赠，互通信息，以物换物的性质。根据上述情况，晋国既有官办工商业，必然由官府垄断、操纵，也必然有主持、经营以至操纵的“商官”，更有如同周室的“司市”等一类的官商机构以及像士蒍、申公巫臣、魏绛等一类的专职或兼职商官或官商。这样，由公室（官府）出上资金，搭上资源，养上工徒，派上商官或官商，实行由官府（国家）垄断的工场、作坊及其产品的运转销售、贸易交换，必然促使那些“仰机利而食”的官商趋之若鹜乘势群集起来，垄断晋国的商业贸易，操纵晋国的商业经济，由此造成晋国商业由官商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

根据当时晋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推断，官商除了经管庞大建筑器材和对内对外货物交易互换，还很有可

能参与军事物资采购，战时辎重运输以及运送战斗、后勤人员奔赴战场的战勤服务。按照这个推断，晋楚城濮之战取得的辉煌胜利，也一定与官商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城濮位于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一带，距离晋国战略腹地近千里路程，当时晋国参战部队为兵车 700 乘，每乘以四马七人计，共有军马 2800 匹，兵员 49000 人。如此庞大部队的辎重、兵器、军粮、饲料等军需物资绝大部分是从晋国国内征购或是在行军中临时征购运往前线的，而且在这次空前规模的战斗，中，下军元帅胥臣还用虎皮蒙住战车马头衡锋。如此庞大的军需物资怎样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呢？根据晋国当时实行的中军元帅兼正卿的军政合一体制，处在战时紧急状态下，作为国家垄断的工商业官员和劳动者，当然也要全力动员起来从事战勤服务。这就是说，晋文公推行的“工商食官”制度，对于晋国取得城濮大战的胜利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

晋文公为顺利推行他所制定的“工商食官”制度，同时采取了优惠工商贸易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就是降低各地关税，平修国内交通要道，为贸易畅通创造条件，并宽限农时，鼓励农耕，商与农互相促进。这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手工业场房、作坊的产品增多了，农牧产品增加了，商品流通量扩大了，从事贩卖活动的商人加多了，并在客观上为私营、个体工商业者的出现提供了机遇。当时，官营工商业部门中的从业人员由于分配不公不断出现怠工和逃亡现象，致使这些部门人员短缺，技术力量不足；而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又要求进行更细的专业

分工，于是，私营工商业者应运而生，出现了百工居肆，各成其业，分散经营的局面，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与此同时，晋国又极力吸引周边国家商人把大量货物投入晋国市场，也极力鼓励本国商人把国内剩余物资和产品抛到国外市场。这样，晋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有由国内发展到国外市场和周边戎狄民族市场的机遇，逐步茁壮成长为一支具有丰富通商经验和雄厚商业资金的私营工商群体，晋国的商业经济也就由最初的官营垄断逐步演变为官营与私营并举，官商与私商并存的双轨体制。

晋文公逝世后，晋国的强盛局面大约维持了近一个世纪。晋悼公即位后，为扭转由于连年战争，国力消耗过大，人民疲惫不堪的局面，决意革新内政，减轻人民负担，鼓励国人积极生产。由此出发，悼公大力推行“公无禁利”和“输积聚以贷”的政策，以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规定开放一切禁利，对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宽容、优惠；并要求自国君以下，凡有积聚，应自行输出，投入流通市场。从此，私商迅速发展起来，逐步取代了官商地位，晋国的商业经济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并涌现出了一批家累千金，富比王侯的巨商大贾。比如，当时的都城绛邑，那些富商们虽“无寻尺之禄”，没有任何官位和俸禄，却拥有“金玉其车”的财富。他们戴着裘毳缀成的皮帽，穿着丝饰银错的衣着，坐着金饰玉缀的车子，往来于各国之间，招摇过市，还“能行诸侯之贿”，即用手中的金钱买通官府，行贿诸侯，足见这些富商在晋国社会上的地位和作为了。

晋悼公还作了一件四邻震动、诸侯怀感的大事，这就

是魏绛和戎这一壮举。晋国境内和周边是与戎狄民族杂居的环境，历来有条戎、北戎、犬戎、骊戎、白狄、赤狄等少数民族环居。自叔虞实行“疆以戎索”政策后，长期战和相间，仇友相替。到公元前 569 年，北戎中最强的一部称无终的戎人，派使者孟乐向晋国献纳虎豹皮毛，请求与晋国议和。此时，司马魏绛坚持和戎主张，向悼公陈述和戎有五利的建议。其中一利就是说明戎狄民族和晋国环居，游牧民族重视货物，轻视土地，我们按照戎狄民族的心愿，赏给他们需要的货物，就可获得应该得到的土地。悼公采纳了和戎的意见，派魏绛出使无终。魏绛不辱使命，通过和戎，建立了晋国与北戎诸部的友好联盟，摆脱了晋国来自诸戎的牵制，使晋国能从此专心一意全力对付楚国，遏制楚国北进计划，保持住晋国从文公时创立的霸业地位，实现了悼公复霸的历史任务；同时在魏绛和戎以后对戎狄实行“以物易土”的政策，晋国用自己出产的丝、麻、旄、玉、竹等物品交换戎狄的皮毛和土地。土地买卖、交换事实的出现，就是土地资源商品化的开始。土地作为商品可以买卖、交换的情况加快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促使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占有制迅速崩溃和瓦解，给新兴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前提。

四、繁荣昌盛

晋国自晋文公执政以来，由于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并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和“公无禁利”、“输积聚以

贷”的优惠政策，天然资源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手工业、农牧业、冶铸业以及其他事业进一步兴旺起来，商品经济也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据文献记载，晋国当时已有作履、结网、编草蓆、做假足、织缟（gǎo，白色的丝制品，如缟衣）、凿玉、制药、制革、制陶、冶铜、冶铁、木器等作坊，出现了金属冶炼、铸造、纺织、染色、造车、造船以及玉、石、骨、蚌、漆器加工等行业。商品交易也就在晋国的全境范围兴盛起来。

地处晋国版图范围的今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出土了用复合范铸造成型的青铜器，含铜量达到98%。证明这一地区早在夏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冶铜、铸铜的历史。这里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晋姜铜”、“司徒郈父鼎”等贵重青铜礼乐器。近年在曲沃翼城两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晋侯墓地又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如鼎、簋、编钟、车马器等重要文物，证明晋国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在西周早、中期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这样大量技术精湛的青铜器皿，有的也已投入市场交易行列。

盐也是晋国的重要物产。春秋时代的解芮之盐与垂棘产的玉璧、屈地产的乘马，号称晋国的三大宝产。故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晋人准备迁都时，诸大夫都提议最好迁移到今运城盐池附近的郇氏、瑕氏居住地，理由是那里“富饶而近盐”。当时晋国和周边戎狄民族的食用盐多由此盐池产盐供应。因盐池地近古解地、芮地，故称解芮之盐。晋国有个巨商猗顿，就是因经营盐业获利而富甲天下的。当时的晋国公室也是拿食盐来交换戎狄民族的虎豹牛

羊畜产和皮革，足见盐在晋国商业经济中的地位。

铁是晋国的又一重要物产。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来在侯马北西庄出土的残铁铤、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铁制农具、西侯马出土的铁针、侯马东周墓出土的铁带钩等铁制工具，证明春秋时期晋国人已经掌握烧矿、炼铁、铸铁技术并且已应用到生产和生活中了。直到公元前 513 年晋国正卿赵鞅和荀寅在汝水（今河南郾城一带）修筑城邑时，用了一鼓（据说是 240 公斤）铁，将范宣子著的刑书条文铸在铁鼎上。这件事不仅说明到晋顷公时期晋国已经有了成文法，而且能把法律条文铸在铁鼎上，也证明晋国的铸铁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精湛的高度。据文献记载，晋国当时已经有了铁制铲、斧、锄、耒、犁等生产工具。铁制农具的使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为开始牛耕创造了条件，从而把农业生产推进到了先进的牛耕时代。晋国的商业经济也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和工商产品的丰富而更兴旺发达起来。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为了流通的方便，作为流通中介物的货币便应运而生了。现已发现的晋国货币有：早期使用的是由贝壳加工制成的贝币。贝主要产于近海地区，可能是与齐、鲁国家商品交换而来。另外，晋国境内的汾、浍河流域也盛产贝类。较贝币稍后的是用兽骨仿照贝壳制成的骨质仿币。到了春秋时期，又使用铜质仿贝和包金仿贝。

与贝币、骨、铜、金仿币同时流行的还有一种金属铸造的货币称做“原始布”，就是最早、最原始的布币。

“布”的形状像古代松土的铲。这是由早期生产工具铲蜕化演变而来，估计大约是晋国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流通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布”又演化为“空首布”。空首布仍然像铲形，只是布体变得小而轻薄，背面上大多数都铸有文字，注明铸造的地名。这种空首布已经改变了原来铲形的体态，完全从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失去使用的价值，专门用为商品交换中的媒介物。

目前考古学家和古币研究工作者已从品类繁多的古代钱币中辨识出 290 多个晋国各地铸造出来的货币。其中发现有铸“智”（今临猗）、“武”（今河北武遂）、“留”（今屯留）、“示”（今祁县）、“同”、“是”（铜鞮，今沁县）、“虞”（今平陆）、“董”（董阴，今万荣）、“亘”（今垣曲）、“鄂”（今乡宁）、“苦”（苦城，今运城）、“吕”（今霍县）、“宁”（今河南修武）、“邯”（今河北邯郸）等标明铸地的晋国货币。还有从侯马古城遗址出土的另一种货币，铸着“新晋共黄钅（jīn，斤，量名，如一钅、二钅）”字样，可以断定都是晋国铸造和通用的货币。晋国货币铸造的作坊分布这样广，币式这样多，流通范围这样大，说明晋国的商业经济和商品交换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

五、开花结果

综上所述，晋国立国时还是个偏侯小国，境内多山，交通闭塞，地少人稀，商业经济自然难以发展，商品交换贸易范围也很狭小，基本上处于“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

采”那样一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自进入春秋时代以来，随着晋文公和晋悼公先后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和“公无禁利”，“输积聚以贷”的商贸优惠政策后，晋国的商业经济便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那些追求经商致富的商贾们也一天天活跃起来了。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商贾队伍的壮大，晋国的商业文化也成长为枝叶繁茂的浓荫大树，绽放出鲜艳之花，结出了累累之果。

那些精通经营之道的商贾们和技术娴熟、工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或经营多面手，一方面凭借自身商品的货优价廉而又善于经营的独特优势，在国内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断脱颖而出，一步步取代了官商垄断、操纵国内市场的地位，成为执掌贸易流通领域主导权的“牛耳”，他们的足迹遍布全晋大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凭借“能行诸侯之贿”的特殊手段，往来于各国之间，打通了国际间通商贸易的渠道，形成晋国商贾四出，西与关内秦国，西北与今山西隰县、离石等地戎狄交往，北与今山西代县、河北蔚州一带的胡、戎贸易，东与今泽、潞、上党一带，东北与今河北邯郸、中山等地民族以至与齐、鲁诸国通商，足迹遍布华夏大地。后来，晋国的通商大邑都变成了商品集散的商业都会。

通过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国内、国际间广阔的通商贸易实践，晋国的商业经济领域涌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巨商大贾，他们继承发扬晋国商业文化的优良传统，总结借鉴前人的成功实践，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经商理财之道或通商贸易思想，在晋国商业经济和商业文化史上谱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

如计然、猗顿等人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计然，是史籍上记述的晋国最早的著名商人，他的先祖曾经是晋国的贵族。计然后来到越国游历，越国大夫范蠡得知他是位经商理财的能手，就拜他为师，聘请他参与筹划越国的军政理财大事，帮助越王勾践走上强国富民之道。计然在越国的主要贡献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为越国提出经商理财的策略。当范蠡向计然提出这个带有战略意义的大题时，计然回答说：商战和兵战一样，也要讲策略。商战的策略，用一句话概括，就叫：“论其余不足，可知贵贱”。这话的意思是根据市场上商品的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知道物价是贵还是贱。市场上货物滞留得多了，物价就要贱下来，货物短缺了，物价就要贵上去。所以要做好商业交易这一行，就要灵活掌握市场信息，准确了解商品行情，才能在商业贸易中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掌握好市场上的主动权。他还指出一个经商的诀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意思是货物价码贵到极限的时候就必然贱下来，贱到极限就一定又要贵起来，这是做生意的规律。经商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经常要注意市场上物价贵和贱的动向，掌握好货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这个市场规律，掌握好贵与贱的变化信息，才能抓住商业贸易的机遇：当物价贵的时候为了防备突然反贱，就要视货物如同粪土那样尽快推出去；当物价贱到极限时，又要看到它必然要贵，就要像对待珠宝一样尽快收回来。这是经商必须掌握好的策略。二是提出做好商业贸易的战术。计然把商业经营当作商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术。要“旱则